

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



意大利卷

我们的祖先

〔意大利〕卡尔维诺 等著

吴正仪 主编

工人出版社

I 565.45

K067



世界著名文学奖
获得者文库

(意大利卷)

我们的祖先

(意大利) 卡尔维诺 等著
蔡国忠 吴正仪 译

责任编辑 莫 多

装帧设计 潘岱子

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意大利卷

我们的祖先

吴正仪主编

吴正仪

蔡国忠 译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保定市华孚商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开本：32 印张：12 字数：290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400册

ISBN7-5008-0199-8/I·46

定价：4.45元

前 言

一

意大利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它曾是古罗马帝国演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的舞台，又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曾经产生过许多历史名人、文化巨匠、文学大师。意大利当代文学是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既与欧美当代文学息息相通，又有着自己民族的传统特色。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曾经伴随着电影画面风靡全球，这便是当代意大利文学的开端。它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反映抵抗运动和战后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为题材，象一阵清新强劲的春风，不仅扫荡了法西斯文学残余，而且也吹落了种种回避现实的文学流派的枯枝败叶，使意大利文坛充满民主精神和生活气息，呈现一派生机。50年代后期，意大利垄断资本主义出现所谓“经济奇迹”，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危机的加深，社会生活更加复杂化，促使作家们寻求新的反映现实的创作方法，文学上出现两个新动向：其一是“工业题材文学”，它起初直接描写现代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状况和工会活动，既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也反映了工人阶级为消灭异化所进行的斗争，代表着文学在内容上的变革，是现实主义文学中一股激进的支流。后来描写的对象有所扩大，出现了以厂主、职员为主人公

的作品，但生活素材仍旧来自工厂，现实主义的宗旨不变。另一方面就是“新先锋派文学”，这是一种标榜与传统文学决裂、力图通过改变艺术技巧来反映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新面貌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20年代先锋派文学的回潮，它代表着文学在形式上的变革。在60年代里，新先锋派的大量的形式主义的试验几乎统治着文学园地。

新先锋派否定一切过去和现存的文学形式，它的种种实验使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遭受摧残，却并没有得出重大成果，致使60年代的文艺显出一幅凋零衰败的惨状。1968年的学生运动就其在文学艺术上的积极作用而言，是其重视作品的政治与社会意义为主张，给了脱离现实的新先锋派致命的一击，使它从此一蹶不振，同时起了振兴现实主义传统的作用。这对于70、80年代的文学发展是一个有利的形势。由于新先锋派对传统的破坏和它自身的被否定，使作家们摆脱了流行的模式，可以比较广泛地进行选择，比较自由地创新。因此，各种不同水平，不同方向的作家相继奉献出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互不干扰、自由生长，既无共同的来源，也不代表共同的前景；有值得重视的个别现象，有重要的作品，但没有形成明显的流派；这是一个文学现象纷呈的局面。具体地说，现实主义原则得到恢复，实验主义在继续实行，独辟蹊径的作品时时出现，消费小说也在泛滥，全景图是斑斓驳杂的。

意大利几项重要文学奖的设立，对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简介如下：

一、巴古塔奖：

一批文学家和艺术家于1926年倡导并自筹资金设立。他们经常在米兰的巴古塔大街的一家餐馆聚会，奖金因此而得名。此项奖授予优秀的文学作品、新文稿和政论文的作者，从历年的评选结果看来，是以小说为主。

二、维阿雷焦奖：

于1926年由一群知识界人士发起，莱奥尼达·雷帕奇长期担

任主席。共设小说奖、诗歌奖、论文奖三项。作品由一个特设的评委会挑选。意大利许多著名文艺评论家先后是该评委会成员，如马西莫·蓬藤佩利，贾科莫·德本内德蒂，纳达利诺·萨佩略等。每年7月上旬在海滨胜地维阿雷焦城颁奖。

三、斯特雷加奖：

由马丽亚·贝隆奇和圭多·阿尔贝蒂于1947年发起并创立，是唯一一份专门授予意大利作家写的散文叙事作品的文学奖。每年从前一年3月30日至该年3月30日之间发表的作品中评选。评委由400名意大利文化各界人士组成，他们都是贝隆奇主持的文艺沙龙“星期日之友”的成员。参加评选的作品必须由两名该沙龙成员推荐，经两次投票选举评定。初选6月份举行，决选于7月初在罗马进行。

四、康彼埃洛奖：

设立于1963年。1958年得到威尼托大区7家工业财团的资助，为此成立了“康彼埃洛基金会”，姜卡洛·费雷托任该会主席。该奖品只授予头版发表的意大利叙事作品。由文学界人士组成的评委会于6月初提出5部候选小说，然后经由代表意大利社会各界的300名读者组成的另一评委会于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威尼斯从中选出获奖者。

五、金笔奖：

这是一项政府奖。1957年由内阁主席团设立，授予那些以他们的作品对于国家的文化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

二

意大利·卡尔维诺是意大利当代灿若群星的2000多名作家中最明亮的一颗，曾获巴古塔奖和维阿雷焦奖。他于1923年10月15日出生于古巴哈瓦那附近的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镇，父亲是意大利利古里亚人，因从事热带农艺学而在拉丁美洲生活多年，母亲

是撒丁岛人，植物学家。卡尔维诺两岁时随父母回国，居住在故乡圣雷莫城，他父亲领导该城的一个花卉实验站。他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仔细观察树木花草、昆虫鸟兽，掌握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培养了热爱大自然的感情；同时他爱读吉卜林、尼埃沃、斯蒂文森，特别是康拉德的小说。为了继承从事科学的家庭传统，他于1941年报考了都灵大学农学系。1943年德国纳粹入侵意大利，卡尔维诺带着16岁的弟弟参加游击队的“加里波第”支队，他的双亲因此被德寇当人质扣押数月。在抵抗运动中他加入意大利共产党。战后他直接进入都灵大学文学系三年级学习，一年之内通过了四年的全部科目的考试，1947年9月以一篇关于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论文毕业。其间，他作为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利古里亚地区和都灵的大学生中间进行政治工作，尤其热心从事党的新闻事业，为《团结报》撰写了许多时事政治性文章，同时也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发表几个短篇小说。1946年12月他仅用20天时间，根据参加抵抗运动的经历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蛛巢小径》，出版后受到好评，获织利乔内奖，他一举成名。

1947年他从大学毕业后，进入都灵著名的埃依瑞迪出版社工作。年轻的卡尔维诺在围绕出版社形成的文化人圈子里结识了一批进步的作家、哲学家，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学上迅速成熟起来。1949年出版短篇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主题仍然是抵抗运动，但写法明显地具有传奇与寓言色彩。1952年发表中篇《分成两半的子爵》，将现实与幻想交织在一起，是第一篇寓言小说。而1954年的短篇集《参战》又仿佛回到了新现实主义文学之中。1956年他花费大量的精力收集整理、编写出版了两卷《意大利寓言故事》。1957年在苏共20大之后，卡尔维诺退出意大利共产党。在这一年里他推出两部在内容上形式上都是对立的小说《在树上攀援的男爵》和《建筑业投机》，前者是寓言小说，后者是写实小说，但主人公都是不肯与现实苟同的人，都是失败的

反抗者，而《男爵》荣获维阿雷焦文学奖。1958年因中篇小说《烟云》获巴古塔奖，同年还发表了1950、1951年间完成的长篇小说《波河两岸的青年》，这两部仍是现实主义作品。1959年写成《不存在的骑士》，1960年将它与《子爵》、《男爵》合并为三部曲出版，并题写了《后记》。这部以异化为主题的著作既具讽刺，又很幽默，是卡尔维诺的寓言式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从1959年到1965年，卡尔维诺与维托里尼主持大型文艺评论刊物《梅那博》。在从事创作和出版业的同时，他从未间断过他所喜爱的新闻工作，为许多家报刊撰写文章。1964年卡尔维诺结婚并迁居巴黎，但频繁往返于巴黎和都灵之间，坚持以埃依瑙迪出版社工作。

《探索者的一天》（1963）是他最后的一部写实小说，此后便全力投入幻想性的寓言、神话的创作之中，充分发挥出他的特长。《马科瓦尔多，或者说城市的四季》（1963）便是一部具有怪诞色彩的寓言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宇宙奇趣》（1965）、《你和零》（1967）是描写宇宙体系、人类起源和社会形成的神话故事，在五彩缤纷的幻想之中寄寓着广博的新宇宙学与天文学知识和深刻的哲学思想。《命运交叉的城堡》（1968）和《看不见的城市》（1972）是哲理性很强的寓言小说。1972年意大利林琴科学院授予他“费尔特里内利”大奖。1979年发表的《如果在一个冬夜，有一位旅人》是一部结构奇特的书，由12章作者的议论和附在其后的10个独立的短篇小说组成。1983年卡尔维诺完成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帕洛玛尔》，以荒诞的故事表现现代人的孤独感和失落感。

综观卡尔维诺的创作道路，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以现实主义走向后现代派的作家，尤其以寓言小说和科学小说为其特色。作为后现代派作家，在艺术形式方面他的特点是在叙事上保留了传统手法，而在结构上使用现代技巧，使得故事既是高度综合、快节奏，又是生动有趣、明白易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现实主义与现

代主义并不总是互相排斥、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融汇、结合一致的：在内容上的特点是幻想与现实的混合，他的故事情节完全出自想象，是超现实的，却又准确地传达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信息，每一篇故事都浸透着现代人的欢乐与痛苦，表达了他们的追求与希望。正视现实，面向未来，热爱人生，热爱大自然是卡尔维诺著作中一贯表现出的积极的思想特色。

1980年卡尔维诺率全家迁回意大利，定居罗马。1985年9月19日凌晨因脑溢血在锡耶纳的一家医院逝世，终年62岁。他的猝然离世使举国震惊，意大利总统科西嘉于当天下午前往吊唁，意共总书记发唁电慰问家属。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1986年5月他的未竟之作《在太阳下的美洲豹》出版，收集了作家在最后几年拟以《五种感觉》为题而写的系列短篇中已完成的三篇。

卡尔维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境，他在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享有崇高声誉。这些地区的评论家和作家对他极为推崇，称他是“最富魅力的后现代派大师”、“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位伟大艺术家之一”、“意大利最独出心裁、最富有创作才能、最有趣的寓言式作家。”

三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并不是一个首尾衔接、前后贯串一致的故事，而是互不相干、独立成篇的三个故事。这三个单独的故事各有自己的始末，似乎难以连缀在一起。实际上，将它们联结成浑然一体的是作者拟定的主题思想，它是起了贯通作用的一根红线。《后记》中的一段话将这题旨说得很清楚：“我要使它们成为描写人们怎样实现自我的三部曲：在《不存在的骑士》中争取生存，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追求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性，在《在树上攀援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

整。这三个故事代表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

这三篇故事互相呼应，互相加强，叠现了小说的主题。它们采用寓言的形式，艺术手法是古老的，没有“时空倒错”、“意识流”等典型的现代技法，也没有心理开掘，只是按照传统方法通过对人物行为的描写来表现人物，但是它们的现代感却十分强烈。虽然题材取自古代生活，可是活动在古老历史背景之上的人物超越了任何历史人物形象的模式，他们带着现代人的全部活力，跃然纸上。这是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和最高问题——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构成小说的主题，使得作品中的现代意识力透纸背。三篇小说从不同角度集中描写了“异化”现象。子爵被分成两半，并且相互为敌，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人异化状况的写照；男爵生活在树上，表现了人与社会的疏离；骑士是一副中空的铠甲，人被异化为“非人”。

然而，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异化”问题已是老生常谈了，从本世纪初的卡夫卡、加缪的经典性名著到50年代贝克特的荒诞戏剧，直至60年代兴起的“新小说”，都已将西方社会人的生存状况与其本质相背离的种种情形描写得淋漓尽致。《祖先》三部曲从思想内容上来说与这些作品是很相似的。《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不都是一种《变形记》吗？而《在树上攀援的男爵》不也是一种《局外人》吗？但是卡尔维诺决不只是重复前人的经验。在卡夫卡笔下，格里高利变成了一只甲虫，屈辱、凄惨地死去，他是一个可悲可怜牺牲品。但是卡尔维诺的只有半个身子的子爵也好，还是形体全无的骑士也好，都不是可怜的虫子，他们是强有力的人物，就象现代派雕塑艺术中那些扭曲、肢解、断裂的造型一样是有力度的，他们不象格里高利那样逆来顺受。邪恶的梅达尔多子爵撕扯着到手的任何东西，尽情发泄胸中的愤懑；善良的梅达尔多子爵为他人奔走，尽量给这个世界增添一些温暖；柯希莫男爵逃到树上；阿季卢尔福骑士时时处处都显示出不同流俗，不合时宜。无论怎样，他们在现实生活

中冲撞,表现出一种冲击力量。因此,他们虽然是残缺的,却不失高大,有时甚至是畸形巨人。这是因为他们是当代人,比格里高利在时间上前进了几十年。格里高利那一代人感受的是在19、20世纪之交西方现代文化与近代文化发生更替时的那种脱节感,即所谓危机意识,他们对现实失去把握,无法行动,他们是倍感压抑的。子爵、骑士们却随着历史的进程,随着现代形态文化的生成,离传统文化更远了一些,他们没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他们把不合理的东西当作现实接受下来,更多地是寻求应对行动。在没有找到正当的反抗方式之前,宣泄是最初级的手段,因而他们不象格里高利似的惶恐不安,而是躁动不安;他们不象格里高利坐以待毙,不象“局外人”那样沉沦、堕落,他们在寻找出路,无论找到与否,他们的结局都显得有几分悲壮,而不单象从前那样的凄凉。他们也比前辈达观得多,不是一味哀悼失去的旧世界,而能够正视现实。他们的生存“焦虑”不再是害怕与旧世界一起被毁掉的恐惧,而是对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一个新的和谐、新的平衡的到来的渴望。在卡尔维诺塑造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明显的历史特征。卡尔维诺的第一个故事中写了子爵重归完整的圆满结局,在第二个故事中构想了一个人生的理想境界,在第三个故事中寄希望于未来。这些设想是朦胧而缥缈的,但表现出了对人生的肯定,而不是虚无;基调是积极的,而不是悲观的。他没有把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荒谬的现实处境夸大为普遍的生存形式从而诅咒人生,否定生存的价值,而是看成可以超越的暂时形式。因而他走出了现代派消极、悲观的死胡同。

《祖先》三部曲是追求三部曲。从表面上看来,《子爵》、《男爵》、《骑士》中的三种追求是那样地殊异:《子爵》要求完整和谐,《男爵》希望分裂与动荡,《骑士》执著于不断的追求。这些仿佛自相矛盾的追求正代表了人类追求的整体形态。因为人的追求有时是对现实的应答,有时是对现实的超越,有时是被动地需要摆脱困境,有时是主动地冲破沉闷滞重的环境。《子

爵》和《男爵》正是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要求。《骑士》中的拉姆巴尔多则代表着人类一贯自强不息的精神。身陷劫难之时，人心思定；居于安乐之中，要弃旧图新。人类总是在动乱与安定交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有所追求，有所进步，生命的洪流向前奔腾不止。这就是卡尔维诺透露出来的对人类生存的宏观认识。这种认识使得作品色彩明丽，基调高昂。本来异化的主题是令人黯然神伤的，但由于卡尔维诺不仅写了人的自我迷失，也写了人的觉醒和奋进，他通过三部曲揭示了危机感、不安于现状和创造生活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关于“异化”的三篇独立小说，谱写成了追求三部曲，使人读后不仅理解了危机意识何以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特征，更能领悟到危机是深刻变动之前必然的准备阶段，感觉到西方文化不仅在摧毁传统，也正在重新铸造。卡尔维诺在对人类的存在问题的探索中，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否定人类文明和人类进步，他对于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人的认识力、创造力都是给予肯定的，尤其赞扬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由于他这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中有肯定，对于现代人的否定之中有张扬，因而在“异化”这个旧题材上，写出了新意，给人以新鲜感。

这是一部将幻象、现实与哲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它将寓言传说般生动的有趣故情作为抽象主题的载体，使深奥的思想得到形象的、有吸引力的阐发；它把古老的文学形式同现代思想意识奇妙地融汇成一体，既以传统的方式使读者从形象上得到感悟，又以现代的方式启迪读者思考，从中得到理趣。作品中呈现出一派明明、乐观的色调，开拓出现代派小说的新风貌。

这部小说成功的奥秘在于哲理性的内容与寓言形式之间的有机契合。通常，寓言模式由于具有以形象图解观念简化现实的功能成为小说表达哲理内容的捷径，但是作品中难免出现观念大于形象的不平衡现象，使艺术性受到损害。《祖先》三部曲有效地克服了这一弊病。卡尔维诺对于寓言深有研究，熟谙个中道理。

他曾经搜集了意大利南北乡间脍炙人口的传说与故事，编成一大本《意大利寓言故事》(1956)。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寓言是真实的……是生活的概括解释……是可以向男人和女人提供的命运一览表。”他认为寓言既是对生活作出的解释，又是生活的真实艺术再现，可见他掌握了寓言同现实的关系。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最古老的寓言模式：孩子在森林里迷路或是骑士战胜遇见的恶人和诱惑，至今仍然是一切人类故事的无可替代的程式，仍然是一切伟大的堪称典范的小说中的图景，其中一位道德人物通过某种残酷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中的活动来实现自我完成。”这就是说寓言规定了文学的原型结构，一切作品都只是这种原型结构的变形扩张而已。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原型说是否正确，至少它说明卡尔维诺认为寓言不仅要有明朗的观念，而且还要有一个浑圆完整的情节，人物形象也必须遵循自身发展的逻辑。总之，卡尔维诺既注意到寓言的“言内之言”的丰富性，又注意到寓言的“弦外之音”的准确性。他在作品中对于故事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追求是明显的，这三个寓言无一不是有头有尾、独立完美的线型结构故事，而且曲折复杂的情节也并未将小说的寓意淹没；另一方面，他用三个故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异化概念，这样的处理分散了故事的哲理负荷，使形象大于单一的概念而不为所拘。小说中的哲理内容、幻想的故事情节、夸张的人物形象内在而有机地相互蕴含和统一在一起了。凝重而有荒诞色彩的现代哲学观念弥散在寓言故事所特有的神秘、空灵、朦胧的美感之中。在故事的真实性和背景上故意造成的混沌，反衬出作家清醒的理性感知。

同时，也许正是由于故事的历史背景的淡化处理，我们只看到由典型关系构成的现实社会的抽象化缩影。而觉得故事中的人和事件超出了暂时和偶然性，有着普遍意义。这些寓言生动地揭示出人的生命感、心理规律、认识逻辑。深刻的哲理通过有典型特征的具体感性形式，使作品含有丰富的象征意蕴，因而能够激

发人们的联想，增加理解的弹性，使含义大幅度扩延。正如卡尔维诺本人所言，这是一种“开放型”小说。

《祖先》三部曲可以说是现代小说对于寓言模式的成功运用。但是，作为哲理小说，它出现了某些整段的纯议论性文字，象征章般点缀在小说里，显得生硬；作为寓言故事，它的有些次要人物以哲理和形象拼合的方式出现，显得死板，这些是不足之处。

吴正仪

1988年8月

目 次

前言	吴正仪 1
分成两半的子爵	1
在树上攀援的男爵	71
不存在的骑士	271

分成两半的子爵

